

试论亚当·斯密的人性观

张 军 孙 宁

由德国历史学派与边际效用学派引发的、长达百年争论的所谓“亚当斯密问题”事实上并不存在。因为《道德感情论》展示的是自然主义的人性论,即认为利他与利己都只是人性的一个侧面,人性既不是完全利己的,也不是完全利他的;而《国富论》中以人的“利己心”为出发点构建经济理论体系仅仅是由于经济科学研究的需要,并不表明斯密对人性的看法有了改变。本文认为,反思这一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问题,对于理解本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对于深入理解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系统阐述市场经济理论的、伟大思想家的整体思想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一、经济学说史中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

亚当·斯密在《道德感情论》与《国富论》中关于人性的观点是否相互矛盾,这是一个引发经济学说史界长期争论的问题。苏格兰伟大的社会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一生论著颇丰,其著作中最为著名的当数《道德感情论》(1759年出版)和《国富论》(1776年出版)。前者的发表使斯密雄立当时英国公认的一流思想家之列,并在哲学史上被后世誉为苏格兰学派的著名人物;后者的发表更使斯密成为世界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之一。但或许连斯密本人也未曾料及的是,这两本巨著中关于人的本性的论述,在经济学说史上引发了长达百年的激烈论争。

在《国富论》中,斯密以人的“利己心”为基本立足点,构建了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对于斯密关于人的“利己心”这一论述,以F·李斯特为先驱的德国历史学派最先发难。他们提出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而在《道德感情论》中认为人的本性是利他的,从而得出结论:斯密在《国富论》与《道德感情论》中对人的本性的论述是不一致的,矛盾的。而以庞巴维克为代表的边际效用学派,随即对历史学派的观点发起反批判。他们认为斯密在两本著作中对于人的本性的论述是一致的,都是具有社会良心的利他主义人性。这两个学派关于这个问题的论争持续了大约100年,在经济学说史上被称为“亚当·斯密问题”之争。

对于“亚当·斯密问题”，我国学术界也一直存在着多种见解。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是将《国富论》中所说的人的“利己心”等同于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直到1986年在我国纪念《国富论》出版21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仍有学者持此观点。不过，该观点已开始失去市场^①。

第二种观点以在我国流传甚广的卢森贝的《政治经济学史》为代表。卢森贝认为，斯密在《道德感情论》中研究的是道德世界，在《国富论》中研究的是经济世界。他研究道德世界的出发点是同情心，研究经济世界的出发点是利己主义，即在经济生活中专门追求个人利益。应该说，卢森贝的上述见解是正确的，但他紧接着又提出了以下观点：斯密经济学中的利己主义如何转变成了它的对立面，即伦理学中的利他主义，斯密本人“并未加以解释”^②。提出这一观点暴露出卢森贝对斯密思想理解不深入的一面。宛樵东与吴宇晖所著的《亚当·斯密与〈国富论〉》一书完全接受了卢森贝的上述观点，认为“斯密没有能把这两个世界联系起来，他没有说明为什么伦理学中利他主义在经济中变成了相反的东西，即变成了利己主义”^③。

第三种观点是朱绍文先生提出的。他认为：“斯密在《道德感情论》和《国富论》中所讨论的‘人性’，是同一时代同一阶层属性的人，是这个时代的新人”，并进一步提出，斯密《国富论》中的“经济人”正是18世纪初以来出现的中等和下层的阶级的化身，是时代的新人^④，而绝不仅仅是抽象的方法论的假设。这种见解认为斯密在两本著作中关于人性的观点并不矛盾的看法是正确的，但将经济研究中抽象化到只剩下“利己心”的人——“经济人”，人格化为某一时代的新人，则与斯密的本意相去甚远。

笔者以为，解决“亚当·斯密问题”的金钥匙仍在斯密本人的著作之中。只要真正理解了斯密在《道德感情论》与《国富论》中关于“人性”与人的“利己心”的本来含义，一切笼罩于这一问题上的困惑自会迎刃而解。

二、《道德感情论》展示的人性观

T·W·哈奇逊在《亚当·斯密200周年纪念》一文中明确指出，要真正理解而不是十分肤浅地理解《国富论》就必须很熟悉《道德感情论》及斯密的其他著作^⑤。此言极其透辟地道出了理解斯密思想的奥妙所在。因为斯密首先是一个社会哲学家，仅仅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理解他是片面的。斯密于1759年出版的《道德感情论》一书，实质上奠定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一书的哲学基础。许多在《道德感情论》中详加论述的哲学伦理学原理，在《国富论》中只是作为既定原理一笔而过。因此，那些没有深入理解《道德感情论》与《国富论》两巨著关系的人，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困惑与误解。事实上，斯密在这两本巨著中对人性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由于研究目的不同，论述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道德感情论》是斯密哲学伦理学思想的主要代表作，要深入理解该书的精髓，必须了解斯密的哲学思想背景。斯密的哲学思想属于苏格兰学派。关于该学派，黑格尔曾在《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中用专节予以论述，黑格尔将斯密与他的哲学伦理学老师弗朗西斯·哈奇森放在一起介绍，并认为“在这些苏格兰学者当中，亚当·斯密是最著名的。”^⑥黑格尔指出，在苏格兰学派看来，“精神的自在性表现在自然存在形式”^⑦。黑格尔所言极是。在哲学思想上，斯密同他的老师哈奇森一样，对自然状态和自然秩序深信不疑，认为如果人们不加阻碍地听任自然秩序自由发展，那么这种秩序要不了多久就会证明，它比人为建立的任何秩序都要优

越。

斯密关于人的“本性”的见解,也是植根于“自然状态”与“自然秩序”这一思想基础上的。他的《道德感情论》认为,人天然地具有利己心、利他心(同情心)、渴望自由之心、注重礼节之心、劳动习惯之心、交换倾向之心等行为动机,其中最基本的是利己心与利他心。斯密认为它们都自然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如果让它们不受干预地自由表达出来,每个人就会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斯密认为,既具有“利己心”又具有“利他心”是人的自然本性,如何使这两种“本性”得以和谐发挥,使社会得益,有赖于“事物的自然”过程。他在《道德感情论》中将这两种“本性”比作时钟上的长针与短针,认为时钟制成后,这两根针就会自动地表示时间,不需要制钟的人去拨动它们。他还使用“公正旁观者”一词代表社会群体的意见,认为如果人的“利己心”与“利他心”之间的作用超出了“适度性”范围,“公正旁观者”就会作出判断。

正如斯密在《道德感情论》一书的开篇所言:“不论我们假定人的利己主义达到何种程度,但是人的本性显然是具有同情他人的遭遇的本能的。”总结斯密在《道德感情论》中对人性的观点,可以看出,斯密既不认为人性是完全利己的,也不认为人性是完全利他的。他所主张的是自然主义的人性观,即认为“利己心”与“利他心”都是人性中自然存在的两个不同侧面。

三、《国富论》中的人性观点

在《国富论》中,斯密的确是以人的“利己心”为基本立足点,构建了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但以人的“利己心”为思路起点构建经济理论体系并非斯密的创举,而为早于斯密的一些重商主义者所首先采用。如英国的重商主义者约翰·海尔斯1549年所著的《关于英格兰王国公共财富的讨论》一书,就已提出了“人是追逐最大利润的”看法。此外,孟德尔于1723年发表的《蜜蜂寓言》也对人作出了类似说明。他们都早于斯密^③,但斯密的相关理论的确更为严谨完善。

斯密的思路如下:(1)每个人天然地都有利己心,如果不受干预,他的行为可以使他达到自己的最大利益。(2)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必须考虑别人的自利,否则就难以实现自己的自利。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交易的通义,即斯密所言:“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求达到那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他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都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④(3)当每个人都能从自利心出发自由地选择某种方式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时,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会将人的自利心引导成为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的力量。即斯密所言,在经济领域里,人所盘算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象在其他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并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

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⑩

斯密上述思路的三个环节环环不离人的自利心，能否据此判定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呢？回答显然是否定的。而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必须首先解释经济学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的有关问题。

正如马歇尔所言，经济学只是研究人的生活的一方面，即只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⑪。经济学并不研究人的一切行为。约翰·穆勒在《论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未决问题》一书中对此作了更为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政治经济学“所关注于人的仅仅是，作为一个人，他占有财富的愿望，而且他赋有达到这种目的的各种可能性的能力。……它将其他每一个人情欲或动机完全抽象化……。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把全部精力用于取得和消耗财富……。这并不说，有哪个政治经济学家会荒唐到这样地步，竟然以为人类生活真正是这样组成的，而是因为这就是科学要前进必然采取的方式”^⑫（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马歇尔和约翰·穆勒实际上都强调了在经济研究中将有抽象到只剩下“自利心”的必要性，并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仅是关于人的“自利心”方面的行为。事实上，要探讨复杂的经济过程，不把人的“自利心”抽象出来予以研究，很难想象对经济规则的研究如何进行。后来的经济学家在人的“自利心”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进行更加规范化的研究。这些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家否认人的本性是多侧面的，“利己心”仅是其中之一；也不意味着经济学家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由“自利心”支配的；更不意味着经济学家认为人的本性完全是利己的，人们的任何行为都是为了满足“自利心”的需要。

因此，作为经济学家的斯密在《国富论》中以人的“自利心”为出发点构建经济理论体系仅仅是由于经济科学研究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他对人性的认识有了改变。斯密的人性观点完整准确地存在于作为社会哲学家的他所著的《道德感情论》一书中，而不是在《国富论》中。

四、深入探讨亚当·斯密人性观的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已经知道，德国历史学派所提出的《道德感情论》与《国富论》中关于人性的论述是相矛盾的这个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事实上并不存在。《道德感情论》展示的是自然主义的人性论，即认为人性既不是完全利己的也不是完全利他的，“利己心”“利他心”都是人性中自然存在的不同侧面。至于《国富论》中以人的“利己心”为出发点构建经济理论体系则仅仅是出于经济科学研究的需要，并不表明斯密关于人性的看法有了改变。对于这一点，国外经济学界通过对斯密哲学伦理学思想的深入研究，现在已基本澄清。如在1976年，T·W·哈奇逊在《亚当·斯密二百周年纪念》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德国历史学派“所非常关注的‘亚当·斯密问题’，即《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之间的对比悬殊甚至矛盾的问题，在今天看来多半是夸大的甚至是想象中的问题（尽管现在依然有不少亚当·斯密问题）”^⑬（着重号为笔者所加）。那么，现在再来反思这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问题是否毫无意义呢？回答显然是否定的。我们以为其意义至少有以下三点：

第一，可以纠正国内学术界在“亚当·斯密问题”上存在的种种错误观点。国内一些学者将《国富论》中的“自利心”等同于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的观点，认为斯密没有解决道德领域的利他心如何转变成经济领域的自利心的观点，都是源于对斯密的整体思想了解不

深入所致。那种将“经济人”等同于某一时代新人的观点,则是由于对斯密的抽象经济研究思路产生误解所致。所谓的“经济人”,就是经济研究中抽象化到只剩下“利己心”的人,马歇尔对此曾有明确定义,“所谓的经济人就是他不受道德的影响,而是机械地和利己地孜孜为利。”^④这样一个概念只是代表人性在经济领域所表现的那个方面,与现实生活中具有多侧面“人性”(利己心、利他心等)的活生生的人绝不可能划等号,因此也无从谈及代表人类历史中哪一类新人的问题。至于谈论“经济人”的品德问题更属牵强附会,因为所谓“经济人”就是抽象掉了品德因素的人,这是“经济人”理论中的常识。

第二,反思这一并不存在的问题可以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的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分支及人文学科之间有着不可分离的密切联系。亚当·斯密在这一方面为所有的经济学家作出了表率。正如约翰·穆勒所言:“实际上,政治经济学是同社会哲学的许多其他分支不可分离地纠缠在一起的。除了一些单纯的枝节问题,也许没有任何实际问题,即使是其性质最接近于纯经济的问题,可以单独地根据经济前提来决定。因为亚当·斯密从未忘记这一真理,他在政治经济学的应用方面经常进行远多于纯政治经济学的思考……由于这一点,在众多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只有《国富论》这部著作,不仅受到一般读者的欢迎,而且在上层社交界人物和国会议员们的中都留下了强烈的印象。”^⑤埃里克·罗尔在《纪念〈国富论〉出版二百周年》一文中也认为:斯密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18世纪的一位杰出的知识分子,对于他来说他在经济理论方面取得的进展与他在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以及其他许多学科中的深思有内在联系的”^⑥。了解斯密在这方面的伟大成就,对于我们理解近年来西方经济学界“回到亚当·斯密”的思潮,理解本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新政治经济学”(包括公共选择理论,产权理论,法学与经济学,管制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等)的兴起同样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第三,反思这一并不存在的问题对于认识国内“亚当·斯密研究”的严重滞后状态亦有重要意义。我国学术界对“亚当·斯密问题”存在种种误解的根本原因,在于斯密整体思想的研究严重落后于国际经济学界。在欧洲,多达六册的《亚当·斯密全集》早已整理出版,各种研究著作更是汗牛充栋,而我国至今尚未有《道德感情论》的完整中译本,研究斯密整体思想的专著亦少得可怜,仅有的一些也大都偏重于劳动价值理论。撇开斯密思想的发祥地不论,单与东邻日本相比,国内的斯密研究亦落后异常。明治三年(1872年)日本就在沿津兵学校的教科书中使用斯密《国富论》第一篇第一章“论分工”的英文原文讲义。1870年由小幡笃次郎译成日文的《国富论》单行本比严复译本早30年,至于对斯密思想的重视程度,中日两国更是差之千里。日本一直把《国富论》当做发展生产力的根本指导思想来学习和运用,而我国1902年出版的严复译本《原富》“却未曾引起任何值得重视的反响”(王亚南语)。建国后到1978年前,《国富论》还仅仅作为《资本论》的辅助读物而存在,根本谈不上对斯密思想的深入研究。而日本早在1949年就成立了“亚当·斯密学会”,到1984年已出版《亚当·斯密研究》三册。1990年举办纪念亚当·斯密逝世2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国家有两个,一个是斯密的祖国英国,另一个就是日本。日本对斯密研究的重视由此可见一般。中日两国对斯密研究及重视程度上的差异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呈现着令人惊奇的近乎完全的正相关关系,这不能不令人深思。现在,我国已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伟目标,加强对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系统阐述市场经济理论的伟大思想家的研究,应是国内经济学人刻不容缓的职责。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曾赋诗云:“亚当·斯密,你现在活着该有多好:英国需要你”。我

们也完全应该发出同样的呼吁：当今中国同样需要亚当·斯密，需要亚当·斯密完整的伟大思想！

注 释：

- ① 参见朱绍文：《〈国富论〉中“经济人”的属性及其品德问题》，载《经济研究》1987年第7期；郭正模《对亚当·斯密“经济人”概念的再思考》载《经济科学》1986年第5期。
- ② 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34、135页。
- ③ 宛樵东、吴宇晖：《亚当·斯密与〈国富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1页。
- ④ 朱绍文：《〈国富论〉中“经济人的属性及其品德问题问题”，载《经济研究》1987年第7期。
- ⑤⑬ 哈奇逊：《亚当·斯密二百周年纪念》，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4辑，商务印书馆1982年3月版。
- ⑥⑦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13—214页。
- ⑧⑫ 曾启贤：《经济分析中的人》，载《经济研究》1989年第5期。
- ⑨ 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14页。
- ⑩ 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页。
- ⑪⑭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第一章，商务印馆1981年版，第11—12页。
- ⑮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8页。
- ⑯ 埃里克·罗尔：《纪念〈国富论〉出版二百周年》，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四辑，商务印书馆1982年3月版，第6页。

（责任编辑 邹惠卿）